



爱之旅

● 谭谈 著

● 漓江出版社



愛之旅

● 谭談 著

●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03号

爱 之 旅

谭 谈 著

*

漓江出版社 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政编码：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375 插页2 字数114,000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00册

ISBN 7—5407—1378—X/I·927

定价：3.50元

目 次

第一辑 爱之旅

我在国外.....	(3)
爱之旅.....	(7)
青绿的日子.....	(34)
相依的山水.....	(38)
庭院里的树.....	(41)
鹅羊池.....	(43)
飘香的歌声.....	(46)
泪水情滔滔.....	(49)
外婆路.....	(52)
故乡有条迷人的江.....	(55)
戈壁新城金川——河西走廊散记之一.....	(59)
塞外江南柳——河西走廊散记之二.....	(62)
鸣沙山上“鸣”乡音——河西走廊散记之三.....	(65)

第二辑 工矿恋

金竹山米酒.....	(71)
燃烧的煤.....	(74)
小事.....	(78)

神灵	(80)
厂长	(83)
力量	(87)
光明的泉	(90)
她和她的“男朋友”	(93)
目光	(97)
主角	(100)
净土	(104)

第三辑 文苑情

翻开书本就见你——怀念黄起哀同志	(111)
莫应丰这个人	(114)
鲜花重放香更浓	(119)
朋友在这里相逢	(121)
满园桃李送良师	(124)
襟怀	(128)
熟读人生这本书	(131)
默默地为文坛添风流	(136)
深深地扎根于你脚下那片热土	(139)
寻回那份真诚	(143)
书本的世界	(146)
我盼春天	(148)
作家当官记趣	(150)
我的酸甜苦辣	(153)
人生又一站	(157)
赶考证	(160)

第一辑

爱 之 旅

我在外国

——访问罗马尼亚记趣

“土包子”出了一回“洋”。

1988年9月22日至10月7日，我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在罗马尼亚访问了半个月。回国后一过磅，我比出国前整整轻了9斤。

进入中年以后，我变得一天天胖了起来。这实在令人烦恼，令人害怕。有人说，快每天早上起来跑步吧。我却偏偏下不了这个决心。有人说，快控制自己的食量，不要吃得太饱。我却又管不住自己这张馋嘴。这一下可好，到外国只呆了半个月，就瘦了9斤。这是个最好的减肥的办法。

这是怎么回事？是那个国家穷，太苦，吃不饱，饿瘦了？要不是那份差事太辛苦，累瘦了？

非也。

怪只怪我这张顽固不化的、不堪改造的嘴。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湘中山地长大的我，有一张“辣椒嘴”。离了辣椒咽不下饭。每回到远地出差，我准备得最充分的，是带一公斤永丰辣酱。有一年被借调到煤炭部帮忙，我带了两公斤辣酱动身。辣酱吃完了，我就呆不住了，闹着要回来。哪怕京城的风景再好，也留不住我了。

这一回出国，我准备得最认真的，是带一大瓶辣酱，一大

瓶长沙腐乳。我用纸将辣酱和腐乳包了又包，生怕在路上打破，“报销”了。到罗马尼亚的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饭店一下榻，我最关心的是辣酱和腐乳。开箱第一个查看的，是这两样宝贝，看弄破了没有。当看到它们都还“安全”，我落心了。

这罗马尼亚的饭真难吃。没有大米，尽是面包。菜呢，肉类，都有一股奶油味；蔬菜，又尽是生的。每回每回，我除了艰难地啃几块面包外，盘盘碟碟的菜，我几乎没有动。这样，我更离不开我那两样宝贝了。再次去就餐，我都不管“洋人”拿什么眼睛看我，定会将那两样宝贝中的一样带了去。

我们代表团由四人组成。团长张锲，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副团长徐俊西，评论家，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作协上海分会党组书记。我和《福建文学》主编蔡海诚是成员。老徐和老蔡，是我们中的“洋”人。他们咽得下这奶油味的“洋菜”，吃得惯那面包。我和团长，就受洋罪了。

于是，团长也只好借助我的辣酱和腐乳。眼看着我那宝贝儿越来越少了，而团长，却每回都不心痛地用勺子挖上一大砣，往他的面包片片上揩。我在一边看着，心一阵阵的痛。在这个特定环境里，我发现自己变得如此的小气，如此的自私，如此的可怜。

有一天，我们离开布加勒斯特，到罗中部的城市布拉索夫参观。本想把辣酱瓶子带上。每回出去，我都带上了。这一回，我看辣酱只剩下一小半了，而腐乳则完全“报销”了。这时，我们离回国的时间，却还有8天。犹豫了好一阵，我决定细水长流，把这半瓶辣酱留在房间的壁柜里了。因为我们

外出参观，两天就回来，这房间没有退。

动身时，团长提醒我：“带上那辣酱！”我搪塞过去了。

两天后，我们从布拉索夫回到了布加勒斯特。走进房间，我自然最关心我那半瓶辣酱。打开壁柜一看，什么都在，唯有这样宝贝不见了。我马上四处寻找、桌屉、衣柜、床头柜，都打开看了。辣酱硬是不见了。我们想找服务员问问，却又语言不通。次日清晨，罗方配给我们的翻译来了。我马上向她“报案”，请她询问饭店的服务员。她很负责任，马上就去问了。一会，她回来了，告诉我们：服务员以为是吃剩的什么罐头，是你们不要了的，因此他们已把它丢了。

我和团长好伤心。

那一、两天，我情绪极坏。好象遗失了最贵重、最贵重的东西，心里象塞满了棉团一样，闷得慌。

我们一天天地瘦了。

在黑海之滨的康巴坦察市，从水族馆参观出来，团长突然不见了。这时，接我们回饭店的小车又来了。我四处去找他。只见他蹲在一棵树后面，把裤皮带解下来了。此刻，正用小刀在上面戳着。

“团长，你这是在干啥？”

“这裤带上的窟窿不够用了，新打一个。”

“这……”

我怔住了。一时哭笑不得。双目定定地打量着团长。他这个大胖子，那圆鼓鼓的大肚皮消了不少了。呵，团长也瘦了。

在回国的飞机上，团长问我：“一到北京，我请你们到家里吃饭。你最想吃的是什么？”

“辣椒，大米饭！”

我不加思索地说。

回国半个月后，我又过了一次磅，那9斤又长回来了。团长呢？裤带上那个新截的窟窿，该不起作用了吧？

爱之旅

人生，寻找友谊，寻找爱情，寻找世界美好的一切。

人生，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曲折崎岖。心灵受伤了，高尚的友情，是医治的妙药；灵魂生病了，真诚的朋友，是高明的医生。

我从山村走出，下过矿井，驻过军营，做过东奔西跑的记者。在地心，在边陲，在京都，在小城，我无时无刻不在寻找，寻找世间最美好的东西，寻找人类最高尚的东西。

那是真诚的朋友，那是高贵的爱情，那是美好的友谊
……

那一天，我从外地回到机关，秘书长告诉我：“中国作协外联部来电话，征求意见，想让你参加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

“你怎么答复他们？”

“我替你答应了。我想，出国访问嘛，总是好事。”

我沉默了。

这些年来，常听到一些议论，罗马尼亚比较……比较什么呢？言下之意，说它不开放，不改革，甚至有点我国“文革”中的味道。在东欧诸国中，是落后的，穷的。既然让我出去开开洋荤，开开眼界，到更宽广的范围里去寻觅一些什

么，为什么偏偏派我到这么一个国度去呢？在那么一个国家里，我能寻觅到什么呢？

是不是向外联部反映反映，推辞不去呢？

两个国家的文化协定中定下了。你不去，总得有人去。想到这，我不觉脸热了，汗颜了。

我终于默默地认领了。等待着，等待着这一天……

1988年，9月22日。

北京机场。

飞机，在我的一种期待、依恋、向往的复杂心绪中启航了。

我开始了平生第一次漫长的空中旅行。

这是北京开往南斯拉夫去的中国民航的国际航班。飞机上坐的多是黄皮肤、黑眼睛、矮鼻梁的人。中间，有周游过世界的外交、外贸人员，更多的是我这样的第一次“出洋”的“土包子”。大家亲切地交谈着，叙述各自的心情。

我不时趴向窗口，向下眺望。三个小时，四个小时过去了。铺在我眼下的，不是绿的山，绿的水了，是无边无际的一片黄灿灿的沙海。它的浩大，给人一种威严，一种征服一切的气势；它的细腻，又给人一种温柔、一种爱的激荡。那一层一层极规范细微的沙的波纹，呼唤你想起母亲温暖的怀抱，想起故乡的荷花池塘……偶然，看到那黄灿灿的海洋中间，嵌上了一个绿团，如同一颗绿宝石。这大概是戈壁长滩上的内陆湖了。

飞机途经卡拉奇机场，经过六、七个半小时的飞行后，徐徐降落在一片实实在在的土地上。

人们缓缓地走出机舱，没了刚才那种谈笑风生的气氛。一双双眼睛左顾右盼。霎时，一种出奇的生疏感，袭上了我的心头。这不是自己的国家了，这不是到处可以和别人交谈的地方了。我们将要在一种语言不通的环境里生活两个星期。这两个星期将怎么过呵！

心 之 桥

“同志们辛苦了！”

在飞机场候机楼门口，突然飞来一声亲切而清脆的问候。这流利的中国普通话，把我们这四位中国人——张锲、徐俊西、蔡海滨和我，都惊住了。环顾四周，不见有中国女性出现在我们面前。只见一位胖胖的、五十余岁的高鼻、金发、蓝眼的外国女性，沉静地向我们走来，伸出她戴着戒指的手。

从体态看，她老了；听声音，却是非常的年轻。

大使馆文化处一等秘书钱亚彬、崔念强连忙过来，向我们介绍：

“这是杨玲博士，罗马尼亚配给我们的翻译。杨玲博士是布加勒斯特的教授，著名的汉学家，是她第一个把我国文学名著《红楼梦》翻译成罗文，介绍给罗马尼亚读者的。”

我们一一与她紧紧握手。

我们就这样和她见面了，相识了。

她象老朋友一样，帮我们搬运行李，安排我们一一上车，和罗马尼亚作家协会的外事处负责同志一起，送我们到布加勒斯特饭店下榻，一切安排妥当后，她陪我们到餐厅吃饭。离开北京前，作协外联部的同志，特意请多年在罗马尼亚大

使馆工作的、文化部的一位同志，向我们介绍了罗马尼亚目前的政治、经济情况。知道他们国家三年内要做到既无外债又无内债，大部分的农产品被运到外国还债，老百姓的生活很苦，吃肉类很困难，多少有一点象我国一九六〇年时的情况。临行前，我们每人都带了点方便面，万一对方安排的伙食，不对胃口和不够份量时，用来做些“补充”。

我们带着一双“看一看”的眼睛，走进了餐厅。

餐厅十分的豪华。有歌女在唱歌，有乐队在伴奏。一张一张餐桌上，摆着一盆一盆耀目的花。用餐的客人也不少，大多数的餐桌边坐了人。杨玲博士选了一张空桌，招呼我们坐下，一位年轻的男服务员走过来，礼貌地对我们欠欠身。杨玲博士问我们：“同志们想吃点什么？”

“我们在飞机上刚刚吃过，肚子很饱，随便吃一点就行。”

团长张锲代表我们回答。

老实说，我们中的谁，也很难具体地说出要吃点什么，也摸不清他们到底有什么？

一切由杨玲代替我们安排了。

一会儿，面包端上来了，牛奶端上来了，每人还有一碟猪排、一碟青菜（生的）、一碗汤。由于什么东西里面都有一种奶油味，我这张吃惯了辣椒的嘴，实在吃不惯，只啃了一块面包，其他什么也没动。

“谭谈同志，你怎么不吃？”

杨玲抬头问我。

“我很饱，很饱。”

我傻乎乎的回答。

紧挨着我坐着的张锲，轻轻地对我说：“他们很难买到排

骨，我们把排骨留下，让她带回家去给家人吃吧。”

“只怕她不好意思，不会同意。”

“我对她说说看。”

张锲同志真的说了。说得很艺术，很有分寸。杨玲却没有我们身上的那种虚荣心，她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

她的眼睛湿润了。

她吐了一点他们国家老百姓的生活情况。突然象勾起了心事一样，她沉默了一阵后说：“我在北京大学读了七年书。是1956年进校的。经过了你们的反右派运动，也经过了你们‘过苦日子’的时期。好好的老师，突然变成了敌人，我想不通。后来，看到中国同学，一个一个地变瘦了。有一次，一个上海的女同学竟昏倒在教室里。我们慢慢地知道了，中国同学吃不饱饭。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的食堂，伙食还是不错。我每次吃饭时，要留下一两个鸡蛋，带回宿舍，喊那位上海女同学来吃。开始，她涨红着脸，硬不吃。后来，她吃了。再以后，我们成了好朋友。我回国以后，又两次到了中国，她都到北京来看了我……”

她越说越动感情了。看来，人，不管国籍怎么的不同，皮肤怎么的不同，语言怎么的不同，而心却是相通的呵！

离开餐厅时，她把我们送给她的排骨，用纸包起来，放进了随身带着的兜里。

这时，我强烈地感觉到，这位外国同胞和我们的距离近了。

以后，她陪我们到雅西、苏恰尔瓦、布拉索夫、康斯坦察访问，陪我们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出版社、杂志社，陪我们会见罗马尼亚著名的作家，出席一个一个的座谈会。我们天

天在一起，朝夕相处。我们感到在罗马尼亚生活，离不开她。她在中国七年，是怎么生活的？她回国后，为中罗友谊做了些什么工作？她的爱情，她的婚姻，她的家庭，她的……我强烈地想知道她的一切，解开这些天涌到我心头来的有关她的一个一个的谜……

“您，能不能向我们谈谈您走过的道路？”

在苏恰尔瓦一家豪华饭店的休息厅里，我向她提出了这个问题。

“怎么？想采访我？”

我笑笑，点点头。

“好哇，有时间，我就向你们公布一下我的过去。”

从海滨城市康斯坦察回布加勒斯特的列车上，我们五人坐在一间软席车厢里，她终于来了兴致，向我们说起了她的过去。

这是一个女汉学家成长的道路。

用中国的习惯用语说，小时候，她是个村姑，是一个不安份的山民的女儿。不安份，常常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兆。家里兄弟姐妹多，负担重，在山村里读完小学以后，父亲就不同意她再读书了，要她下地干活。她却不甘心，总想知道自己这个山村外面是一个什么世界。有一天，她穿着一双新布鞋，偷偷地从家里跑出来，搭上了一辆到小城里去的马车。她是同村里一个女伴一起走的。那个女伴要到城里去考师范学校，将来准备当一名小学的教师。她也动心了。

两人来到了离故乡七、八十里远的县城，双双报考师范学校。第三天，她刚刚考完，父亲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这个老实厚道、而又性情暴躁的农民，双目圆瞪，一脸阴沉，